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丛书



*China's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its Modern Value*

中国传统
政治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以白鲁恂的研究为考察中心

张英魁/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价值:以白鲁恂的研究为考察中心/张英魁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 - 7 - 5117 - 0065 - 0

I. 中...

II. 张...

III. ①政治思想史 - 研究 - 世界 - 现代 ②政治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D091.5 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0551 号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高立志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6(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 cctpbook. com](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98 千字

印 张 12. 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 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目的	1
一、研究动机	1
二、研究目的	6
三、核心概念	10
四、文献综述	10
第二节 研究途径	16
一、研究架构	16
二、研究方法	19
第三节 研究范畴与限制	21
一、研究范畴	21
二、研究限制	22
第二章 白鲁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的形成	24
第一节 白鲁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的背景	24
一、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兴起及其发展	25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过程	31
第二节 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35
一、过渡政治理论	36
二、政治发展理论	37

三、政治文化理论	40
第三节 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观形成的方法论基础	44
一、权力研究法	45
二、心理文化研究法	46
第四节 白鲁恂之生平及学术生涯之三个阶段	49
一、生平简介	49
二、白鲁恂学术研究之三阶段划分	52
 第三章 白鲁恂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	56
第一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56
一、白氏对大众政治文化基本特征的认知	57
二、白鲁恂对精英政治文化基本特征的认知	65
第二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道德政治文化	70
一、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中西比较视角的分析	71
二、德治的政治文化传统	78
三、道德政治文化解析：由道德至权力的路径	82
第三节 白鲁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的框架	87
一、中国人的天命观	88
二、中国人的历史观	91
三、中国人的权力观	93
 第四章 成克杰、慕绥新腐败案及引发的相关探讨	97
第一节 腐败的相关理论探讨	97
一、腐败的意涵	98
二、腐败的类型	101
三、文化与腐败的相关性	103
第二节 成克杰、慕绥新腐败案再现	106
一、成克杰腐败案再现	107
二、慕绥新腐败案再现	114
第三节 高官腐败案所引发的相关探讨	118
一、高官权力监督问题	118

二、高官家庭成员共犯与小圈子内犯罪	121
三、高官人格与道德	122
四、高官行为的两面性	123
第五章 以白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对高官腐败案的诠释	125
第一节 以道德政治文化为核心的整体诠释	126
一、权力之路：由道德而至权力	126
二、道德政治导向的权力监督缺失	128
三、单一结构权力观导向的权力监督缺失	131
四、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	134
第二节 高官腐败案的大众政治文化诠释	136
一、需要秩序与依赖集体：中国人的心理安全感之获得	137
二、在权威下生活：秩序与集体需求的有力保障	139
三、潜在的利益分配路径：关系	141
四、圣王期待的层级下移	147
第三节 高官腐败案之精英政治文化诠释	150
一、伪善的性格倾向与双重性格	151
二、偏爱戏剧化与作秀的政治心理	152
第六章 白鲁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评析	155
第一节 白氏中国研究的特点与定位	155
一、行为科学与白氏中国观	155
二、美国国家利益与白鲁恂之中国观	157
三、美国汉学研究 with 白氏之中国观	159
第二节 白鲁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适用性反思	165
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核心认知的评析	166
二、白氏研究的适用性反思	169
第三节 结论	176
参考文献	181
后 记	191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目的

一、研究动机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世纪里，中国人正努力探求一条道路，以便能使中国这一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避免更多苦痛，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康庄大道。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上个世纪曾经说过：“显而易见，中国目前（1920 年代）的问题主要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能单独加以讨论。我个人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① 八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回头再来重新审读这句话，仍旧言犹在耳。中华传统文化究竟是负累，还是未来政治文明的源头活水？

从表面来看，西方文化的确深刻影响或者左右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以及权利、义务等价值观念都已经融入了我们自身的文化之中，并逐渐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从个人行为所体现出的文化意涵来看，中国人在从西方引入的诸多制度框架之下，却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行为方式，遵循着传统为人处事的潜规则，形成了文化现象表面和实质两分的情况。美国

^① 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 年，第 1 页。



人类学家怀特说过,“人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他们生长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上”,^①人类的行为是由自身特定的文化传统所导正的,外来文化的移植或者强力引介,很难改变一个民族文化的内在深层基因。就中国文化的现实而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内在地规定着中国人的外在行为,抵制着异己文化力量的侵犯与干扰。“一个民族的行为并不是取决于它的体质类型或遗传素质,也不是取决于它的观念、欲求、希望和恐惧,同样不是社会互动的过程;一个民族的行为取决于它外部的、超体质的文化传统”。^②

科玄之争与自由主义和新儒家之辩所争论的焦点是文化,其实这两次争论的过程本身,也处处透露着文化的意涵。对宪政民主的追求,可视为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共识;但是,对于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的相容问题,二者则产生了严重分歧。因此,中国民主化的文化资源与路径选择问题的讨论,依旧延续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一回应模式,其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延绵不绝于当今之世,如何与马列主义合纵连横,同样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的重要问题,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

中国政治现实为我们进一步讨论提供的语境是变动不居的。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在变与常之间徘徊不定,有过短期的稳步发展,也有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十年的非正常状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形势出现了逐渐好转的局面,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也改善了中华文化的生存状况,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一缓进形势受到震荡。在努力探求的过程中,“德”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恒久话题,从政体形式上来看,从传统的封建王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产生了巨大的飞跃,而重“德”这一治国理念,却表现出其背后持续坚韧的文化连续性。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的通汇问题已经被政治领袖们所关注。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迅速的资讯化使社会转型过程变得异常活跃。网络、

^① 莱斯利 A. 怀特:《文化学》,转引自甘阳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二)》,三联书店,1987年,第498页。

^② 同上。

大众传媒为相互碰撞的思想提供交锋的舞台,为不同的声音安装上了扩音器,虽然许多话题仍旧敏感,但多数言论已经能够得以迂回表达,以前不可能被公众所知的事件,如今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固定的途径去获取和求证这些信息。^①由国家掌控的电视台已经不再是国内国际重大事件唯一可以获取信息的途径,政府媒体的信息发布权威受到挑战。报纸、电视与网络各种媒体以报道最即时、大众最关注的事件来获取更高的媒体视阅群。在这种宏观背景之下,大众有机会借助于媒体报导获取大量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个体的判断和取舍,形成自己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感性认识。政府在大众和媒体的关注之下,不得不注重政府自身的形象和政策的效绩,做出诸种政府自身整肃与自我约束的廉洁行动。

多源信息所传递的种种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还是政治性议题。社会中出现的重大事件,国际冲突产生的局部战争以及政府内部出现的腐败现象总是容易吸引大众的目光,而这种关注更多的并非是事件本身,而是对这些事件当事人的道德质疑。2003年黑龙江的宝马案引发了网络、报纸和电视媒体的大讨论,其矛头直接指向宝马案涉案人背后的社会关系;^②而李纪周,成克杰等高官腐败案中,对于高官道德的质疑也在传媒上随处可见;^③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2004年博士招生事件,网络BBS和媒体上对其人品和道德进行质疑和谩骂之声如潮;^④诸多进入大众视野的事件,从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中不难发现,媒体(网络)、大众与政府这三者之行为方式,无一不受传统文

① 网络因其虚拟身份的特征,使得言论控制面临技术上的困难。网络的普及与网络技术的提高,使政府对网络言论的控制更为困难。政府权力与网络科技之间的错位,使得言论控制必须通过技术环节得以实现,这一中间环节所造成的真空地带,为信息传播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② 据21世纪新闻网报道,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刘东辉否认涉案人员苏秀文是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的亲属,韩桂芝也公开回应媒体的质疑,称自己与涉案人员无关,参见:<http://news.21cn.com/zhuanti/domestic/bm/>,2004年10月20日。

③ 李纪周、成克杰案中所体现的传统政治文化意义十分明显,因数李成二人身居高位,更体现了传统精英政治文化的一些特征。在本文案例研究部分将有详细论述。

④ 新语丝网站在朱苏力招博事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版块则对此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口诛笔伐。其有理性的分析批判,亦有情绪化的谩骂与人身攻击。其中理性批评的人多属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而意气用事之谴责、谩骂者多具草根情结。从这两方面来说,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在此事上充分表现。可参见新语丝 www.xys.org,天涯关天茶舍对朱苏力的道德质疑:<http://www.tianyaclub.com/search/searchfast.asp?vitem=no01&idWriter=0&Key=0&Part=0>,2004年10月20日。



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透视出传统政治文化的丰富内涵。“道德评价”仍然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诚然，在大力推行依法行政的今天，政治权力运行是否合法，政府政策是否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已经纳入了人们的评价体系，但一般对政策本身的评判仍居于道德评价之后。^①

以上列举的种种现象无不指向一个足以引发作者兴趣的研究主题：在现代中国政治中，道德因素与现代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者可以进一步追问：领导者的道德形象的拥有和丧失意味着什么？犯罪高官为何不可能具有道德形象？根据道德的重要性在现在社会的突显，是否可以像上文所提到的人类学家们那样认定：中国现代社会中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仍然是政治行为的内在根据？也许这种假定并不严密，但却引导着笔者努力去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在政治的影响。

把目光从东方转向西方，我们也可以发现道德同样在政治的领域有着其悠久的历史。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伦理学》一书中便诠释了他的德性观念。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区分为伦理德性（ethical virtue）与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伦理德性是实践的，在众多过与不及中寻求中庸；而理智德性不付诸于实践，它只有真假之辨，而无善恶之分。后来道德与政治二者渐行渐远，时至今日，道德在西方已经不能作为衡量政治人物的主要标尺。西方人视政策的实效与结果为评价政府行为的准则。2001年广受世界媒体和美国公众关注的克林顿绯闻案中，更多美国公众关注的并非是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暧昧关系，而是其在法庭调查时作伪证的违法事实。此案在经过热炒之后的民意测验中，仍旧显示有68%的民众认为克林顿不必辞职。可见美国公众对克林顿的政绩之评价、能力之信任并未因其个人道德瑕点而不可收拾。诚然，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道德并非与政治完全绝缘，但道德对政治影响力之微弱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恰恰与之相反。

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道德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政治领袖的道德如果被公开质疑，往往预示着将会迅速失去其权势，另一方面，失势的政治人物

^① 中国政策的失误，如果不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一般来说不会被追究，而且其官位一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从一些犯罪官员事发之后，对其在任时政策的追查可以发现，有些官员在其升入更高官位前，已经犯了不小的错误，但并未影响其升迁。

往往首先被指责为一个失德的人。在西方社会中，道德是属于个人领域中的事务，一个人想要获得政治权力不必完全凭借道德的高尚。在一个私人与公共领域双峰对峙，世俗王国与精神王国二水分流的局面中，道德被保留在个人事务的范畴中。那么，在中国，一个政治领袖为何必须是道德的楷模？道德形象是政治精英拥有政治权力的必要条件吗？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道德评价与政治评价二者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对于诸多问题答案的探求便是本文研究的起源。

国家重视道德治国的作用，媒体诉诸于道德评价公众人物和政治人物，大众以道德来评判他人的功过是非，均体现出道德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其实，“重道德”这一现象本身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沿此思维的理路深入下去便会发现，对于政治领域“道德”现象的关注其实是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因为道德诉求本身所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内涵的或外显的，对什么是值得做的、最好去做的（desirable）一种构想。这种构想影响了个人或群体的行动方式、途径以及目的的选择。”^① 价值观对人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对人和对事的判断标准也深受此影响。根据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一般认为价值观的形成是通过社会化和政治社会化过程来习得的，^② 文化传统的传承凭借社会化的过程，使文化领域内的人们获取一种大致相近的价值观，使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能够被互相理解。重道德的价值观必然使群体或者个体在行为上遵从于道德的导向作用，在思维方式中注入“言必称道德”的定式，在人格特征中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道德形象，在情绪感情中加入大量道德的成分。应当明确，重道德的价值观之形成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道德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欲把握中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以道德为研究中心来切入，不失为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

① 克拉克洪（Kluckhohn）认为价值所讨论的是感情（affection）这个因素，而价值取向则包含了感情、认知及方向。他认为价值取向是：“影响行为的一套相当普遍的、有组织的概念系统。这套概念系统是有关对大自然的看法、人在大自然的位置的看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及对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时的一些值得做的，及不值得做的看法。同样的环境事物，由于不同文化对它们存在的看法不同，而致使我们对它们持有不同的价值观”。

② 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认为社会化是人们习得人格特质的过程。参见艾萨克著，朱坚章译：《政治学的范畴与方法》，台北：幼狮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5版，第209页。



二、研究目的

“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是“舶来品”，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为中國大陸学术界所重视，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从西方政治学科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时期，^①而政治文化研究之途径，发端于第四个时期即“行为时期”（1923 - 1969）。正所谓不破不立，英国学者华莱士（Graham Wallas）在其《政治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一书中批评当时“几乎所有研究政治的学者都在分析政治制度而避免对人的分析”的同时，美国学者本特利（Authur F. Bentley）在《政府过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一书中也抨击当时的政治学是一种死的政治学，只对政治机构的最表面特征作形式的研究。这两位学者都对政治学的上个阶段过分重视制度的研究方式提出了批判，表达了突破政治学研究困境、开创新局面的要求。此时，自然科学之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其它学科之中的成功运用也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样本，以美国政治学家梅利安（Charles E. Merriam）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应运而生，开创了行为研究的新阶段。政治文化研究正是在行为科学的背景之下产生的。这一概念及研究途径立刻受到了众多西方学者的欢迎。

人们对政治文化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政治研究中的法律制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动。而现实政治也是促成人们去认识政治文化的重要因素。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许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宪政的垮台再次警醒世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与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那种认为稳定的民主政体主要依赖于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的观点显然是不全面的。^②在以往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中，有人将政治文化作为独立起作用的因素予以高度评价，甚至将其视为导致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因素。R. 戈斯泰尔就认为，适宜的经济条件对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帮助的，但对民主扩散的更长过程来说它是第二

^① 关于政治学科的五阶段划分，参见胡佛为西方学术巨擘所写的序言，引自唐光华著：《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2 年。

^② 戴维·米勒等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大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595 页。

位的因素。他的结论是，在特定国家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传播的相对效果的产物”。J. 皮诺克把民主需求的各种因素分为三类：历史、社会经济秩序、政治文化。他认为，政治文化因素可能包括了民主的最好解释。也有人把政治文化作为受其它因素特别是经济发展制约的因素，作为一个起中介作用的变量引入民主问题的研究。在这些学者那里，政治文化是作为随时代变化和现代政治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变的因素来考虑的。根据这种观点，“政治文化也许是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键的联系环节”。它们具有民族性，由该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形成，有其相对稳定的特征。虽然政治经济现代化过程对它的表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影响，但它深层结构的变化仍然是有限的。政治文化研究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当代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驱动下，民主能够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区域建立起来吗？^①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如若不然，世界上很多地方便会失掉民主的梦想，世界上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证明了经济对民主成就的巨大影响力，政治文化因素已经很难起到对制度直接的颠覆性作用，但却依旧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运行及其效率。这种对“政文化”在民主化过程中作用之定位，就是本选题所展开讨论的基点。

通过了解“政治文化”研究缘起的历史背景以及“政治文化”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可以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政治文化研究应该遵循何种方式，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应该如何把握。十分明确，从政治文化研究缘起之时开始，便与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把政治文化研究的立足点放置于现在政治发展过程之中，寻求政治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解释，并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研究所得之成果预测政治发展的未来趋势，正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题中之意。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对中国实然政治文化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探讨更为合理的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模式，以便做到“刚柔相济”。

但是，现阶段大陆学界之政治文化研究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由于中国学

^① 参见丛日云著：《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术环境所限,^① 大规模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难以实行, 一些关键性的政治心理因素无法显现, 使得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与政治民主化建设并不十分契合。现实政治文化研究多依赖规范研究所得之结论, 虽然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研究传统政治文化, 能够得到一些分析模式, 并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分析具有参照作用, 但规范分析难以切实把握政治文化的现实, 并对其产生直接作用。所以, 在现阶段经验研究难以深入展开之际, 借助于西方较成熟的中国政治文化之研究成果来反观自身的政治文化,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自观”与“他观”研究途径的结合, 首先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其一, 学术界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土壤, 进行自观认识, 这应该是研究政治文化的主要努力所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起, 已经有学者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比如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从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提出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分析模式——王权主义, 对中国历史上诸多的政治事件具有较强的解说能力。^② 以徐大同先生为核心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团体, 通过对西方政治思想与思潮的深入研究, 对认识、借鉴西方优秀政治文化传统并为我所用做出了很大贡献; 其二, 立足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 通过他观的方法对中国文化和政治文化的认知, 对我们认识自身也非常有助益。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 从 16 世纪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 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之时起, 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 到德国的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 再到英国的培根、休谟、罗素、汤因比等都对中国的文化多有关注, 并有人专门著书研究中国文化和宗教。^③

①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领域, 当然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研究传统政治文化, 也能够形成一定的分析模式, 对中国现实政治文化研究亦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但是, 政治科学意义上政治文化研究的缺乏削弱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种, 学术环境的限制是最为主要的。

② 刘泽华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刘先生在《中国王权主义》中提到, 在中国完全世俗化的社会中, 最高王权不是在社会经济中受经济规律支配形成的, 而是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 是武力争夺的结果。这表明不是经济力量决定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 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 王权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 而不是经济运动决定社会结构。参见刘泽华著:《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③ 这些西方思想家与学者们对中国的认知, 很难摆脱自身文化背景的限制, 甚至有许多道听途说的记述。但在行为主义革命兴起以后, 西方的汉学研究更多倾向到政治科学的道路上来。

一大批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文学和艺术等的学者形成了一个汉学家群体。在这些汉学家中,许多人以中国历史或现实政治为研究对象,关注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经济改革进程,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自己翻译出版的著作就有上百本之多。十多年前,刘东先生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言中就指出:“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① 研究海外的汉学,有利于认清我们的政治文化实质,对于克服反理性的方面,适当限制非理性方面,培养理性的政治文化基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行为主义背景之下的西方学者中从事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者,首推白鲁恂。他数十年如一日,对中国政治文化与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用功最勤,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绝对权威。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其致力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著作颇丰,有很多人未及见之。^② “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③ 因此,对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观的研究,应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笔者希望通过分析整理白鲁恂依文化心理学的分析途径对中国政治文化做出的相关研究,建构出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道德政治文化。在把握这种政治文化模式之后,以中国高官腐败案为例,进一步探讨道德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及作用,进一步揭示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最后,对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道德政治文化进行充分检讨,检验其对中国政治现实的适用性,进而发现其结论的缺陷与不足。

① 参见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言,此套丛书于2003年8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包括马克思·韦伯之《儒教与道教》,许理和之《佛教征服中国》,魏斐德之《洪业》,余英时之《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杜赞奇之《文化、权力与国家》,艾恺之《最后的儒家》,布迪与莫里斯之《中华帝国的法律》,罗兹曼之《中国的现代化》,汤森之《中国政治》等。

② 台湾学者唐光华在20年前曾经对白鲁恂的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进行过专门研究,出版《政治文化上的沉思者——白鲁恂》一书。在此书中他曾经预测白氏将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领域中有更大作为,至今其言可以说已经被证实。

③ 参见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言。



三、核心概念

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将其限定为历史和过去。刘泽华先生指出：“我们所说的传统政治文化与传统的政治系统相对，即中国古代君主政治赖以生成、运转和发展的文化条件背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同于研究现代政治文化。现代政治文化研究以现实人的政治心态为主……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已经消失……要通过分析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展现出历史人的政治心理、情感和意识”。^①

第二种观点是将传统政治文化界定为“发展到今天的东西”。如朱日耀先生就坚持，“每一历史时代的人们既是传统文化的承受者，又是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无法与历史传统隔绝……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把传统政治文化看作清中叶以前的文化，而更应该注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连续性。我们体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不应该把重点放在体认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文化上，而应该着重积淀于朝代的传统文化”。^②

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第二种观点，即认为“传统政治文化是发展至今的东西。”而本文所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认为政治文化以人们的政治心理为核心。政治文化概念在第二章理论部分有详细阐述，此处不赘言。

四、文献综述

从白鲁恂著作之译介方面来看，《中国人的政治精神》（*The Political Spirit of the Chinese*），《中国政治的变与常》（*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中国的商业谈判风格》，是笔者所见台湾翻译白鲁恂的著作。大陆学术界早在1990年代初就由河南大学翻译了白鲁恂的《东亚政治体制》。人民大学新近出版的一套汉学家研究毛泽东的系列丛中，有白鲁恂的《领导者毛泽

① 刘泽华、葛荃、刘刚：“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② 参见朱日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6期。

东》一书。白鲁恂的一些著作（数量极少）在国内较大的图书馆能够见到，比如他的《政治发展面面观》（*Aspects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个革命社会的管理》（*The Manage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Society*）等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心库就有收藏。

从对白鲁恂思想之研究方面来考察，台湾的研究状况要远远好于大陆学术界。笔者已经见到有数本著作利用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所获得的分析模式来解读台湾政治现实，抑或研究两岸领导人（比如邓小平和李登辉等），而且也有学者专门著文研究其政治发展理论（如《韩庭顿和白鲁恂的政治发展理论》）。批评白鲁恂的文章与褒奖白鲁恂的文章在台湾均不少见。在1980年代，台湾出版了西方学术巨擘大系，白鲁恂作为其中之一（这套丛书中包括伊斯顿、亨廷顿等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被专门研究，成书即唐光华著《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这是迄今为止笔者见到的唯一一本研究白鲁恂政治理论的专著，此著作主要研究重点在于白鲁恂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过渡政治三种理论。除了对白氏这三种理论体系做了系统研究之外，从合法性与认同危机两个方面对政治文化危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是对于白鲁恂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虽有提及但并未展开。这与此著作的体例限制有很大关系，也与白氏在1980年代之前研究重心还未完全投放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密切相关。二十年过去，白鲁恂致力于中国政治问题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正像唐光华在著作中所预见的那样“见许多人未见之处”，事实证明这种预见是正确的。

台湾大学的石之瑜教授对白鲁恂很有研究，在1993年6月的《美国月刊》第8卷第6期上发表题为《白鲁恂中国观的评述》一文，对白鲁恂进行专题研究。在这篇文章中，石之瑜指出白鲁恂的文化心理学研究方法在美国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他认为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认识，并非像一些人所批判的，是“种族主义者”的认识。对于白鲁恂种族主义的指责与方法论上的诘难，进行了反击，他认为无论批评者措词怎样严厉，都没有真正从白氏的研究本身进行反驳和批判，这也正从侧面反应了白鲁恂中国观的解说能力。^①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对儒家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所凭

^① 参见《美国月刊》第8卷第6期，1993年6月。



借的视角就是白鲁恂与王德威对儒家的不同认识。^①

在台湾学者李英明的著作《邓小平与后文革的中国大陆》中，紧扣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凭借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对邓小平的政治人格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也分析了白鲁恂观点的局限性，可以说这是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模式在具体学术研究中的应用与检试。^②

周翊婷女士 2001 年就读台湾大学期间所做的硕士论文即以白鲁恂的文化心理学研究为理论模式，用以分析台湾大选中的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文化特点。在此论文的前半部分，她综述了白鲁恂依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途径所获得的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认识，并认为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对台湾政治现实的解释力是不容忽视的。笔者做硕士毕业论文时曾与其进行了多方沟通与广泛探讨，获益良多。^③当然，台湾对白鲁恂的研究肯定不止于此，但笔者精力有限，不能更为详尽地查询。只选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白鲁恂被中国学者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在政治发展理论与政治文化理论方面的贡献。在每一部政治文化理论的著作中，均会在阿尔蒙德与维巴之后提起白鲁恂。白鲁恂对政治文化的定义被重复引用，并不是说白鲁恂的政治文化理论不够丰富，这与国内学术界所掌握之有限的资料有关。^④白鲁恂被视为政治文化理论的建构者之一，其学术地位已经得到了各方的认可。然而由于白氏结论多涉及对我国政治的批判，^⑤造成了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其研究成果无法被国内学术界所承认。更进一步说，是思想的禁锢造成了白

① 参见石之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本土宪政主义中的德治与权力”，台湾大学政治系：“宪政体制与政党政治的新走向”研讨会论文，2000 年。

② 相关资料参见：http://www.readingtimes.com.tw/books/book_detail.asp?pclassid=ba&prodid=BA0136&descid=30318，2004 年 6 月 5 日。

③ 周翊婷是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她与笔者就此选题的相关问题进行过多次的讨论，并给出了相当重要的意见，特别是她对案例分析部分的坚决态度对本文之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影响。此部分资料承蒙作者惠寄，并提供了台湾学术界的诸多学术资料与学术信息。

④ 比如高洪涛著：《政治文化论》、马庆珏著：《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等有关政治文化理论的著作中，在政治文化理论或者是政治发展理论层面关注白氏。

⑤ 白氏对文化大革命原因解释、中国政治中老人政府的论述、国家领导人的行政风格等等国内学者较为敏感问题所做的评析，不但政界上层领导不能接受，就是有些学者也不能接受。